

让基础研究插上科学传播的翅膀

——第75期双清论坛会场侧记

刘 莹 李红林

2012年6月9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化学科学部、政策局联合主办第75期双清论坛,主题为“科学基金工作中科学传播问题的探讨”。本次论坛由中国科普研究所承办,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人民日报》、《中国科学报》以及科学松鼠会等20多家高校、科研机构、部委机关以及媒体和NGO组织的50多位专家学者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秘书长高瑞平,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君,基金委化学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梁文平共同担任论坛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何鸣鸿以及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程东红出席会议并做开幕式讲话,国际ITER组织总干事办公室的传播部主任Michel Claessens也应邀参加论坛并做大会报告。

本次论坛共有18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报告和大会报告,主题涉及科学传播与基础研究相互作用的基础理论、国内外科学传播与基础研究相互促进的现状、问题、对策、实践案例及发展趋势等,以及如何促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工作者积极开展科学传播的相关政策建议等多个方面,旨在结合我国现有的科学传播基础,凝练和提出科学基金中科学传播急需关注解决的重要问题或相关政策,同时探讨促进科学传播与基础研究有效互动的

机制、模式及方法,以更好地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

交叉学科领域的“跨界”碰撞

本届双清论坛最大的特点是“跨界”,科学传播作为涉及交叉学科的宽泛议题吸引了来自不同领域专家和学者的共同关注。首先体现在与会专家学者结构的交叉性。本次双清论坛的代表既有来自自然科学领域(如地球物理、化学与分子、地球系统科学、生物学等)的科学家,也有来自社会科学领域(如科技新闻与传播、科技政策、科技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的研究者。既有来自科学传播实践一线的科普工作者(如《科普研究》编辑部、果壳网),来自科学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中国科学报》等),也有来自科研及科学传播管理部门的专家学者。既有年长的科学家、院士,也有年轻的科研工作者。

其次,论坛的“跨界”特点还表现为探讨话题的多样化和议题的宽泛性:

第一,论坛报告的内容视角既有宏观层面的鸟瞰,也有微观层面的深入。论坛开幕式上何鸣鸿副主任和程东红副主席的报告即从宏观层面上提出了对基础研究与科学传播相结合的大背景和对本次论坛的期望。围绕这些背景及期望解决的问题,一些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的具体实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罗勇研究员、

收稿日期:2012-06-30

作者简介:刘 莹,博士,中国科普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科技传播政策、公众理解科学研究、科技传播比较研究等,

Email: lxsyou@ustc.edu.cn;

李红林,博士,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传播与普及、科技与社会, Email: lih104@gmail.com。

王彦波博士、袁红莉教授等都以一个科研工作者从事科学传播的具体事例以及切身认识进行了交流。

第二，报告内容既有理论层面的思辨，也有实践层面的经验。李正风教授从知识流动、知识分配的视角探讨基础研究中的科学传播问题；刘孝廷教授则从理念层面指出我们应该以一种 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科学观为基础来理解科学传播问题，并形成科学传播最基本的规范，让科学家认为做科普不再另类，以推动广大科研工作者都来做科普；汤书昆教授结合新媒介传播时代的新特征，提出要从制度设计等方面，尽量规避浅阅读的模式，促使公众主体能力和文化习惯的养成，真正促进基础研究的科学传播积极地走向新媒体人群；翟杰全教授从科学传播学的视角，探讨了科学开放的新时代对科学传播的要求，进而提出了科学基金促进科学传播的若干建议。在实践层面，马玉国教授结合自己以国际化学年为契机开展的化学科学传播的实践向大家做了介绍，并分享了一个年轻的一线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宝贵经验；王彦波博士结合自己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开展科学传播工作的实践，总结其中的问题和困惑，并提出了自己的探索性见解。袁红莉教授则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视角，探讨了她的科技工作者从事科学传播的认识及经验。

第三，既有国外经验的总结，也有国内现状的分析；既有来自官方组织的经验总结，也有来自民间组织的典型案例；既有问题分析，也有实证的调查研究和对策建议。Michel Claessens 结合欧盟研究计划及 ITER 项目中的科学传播进行了介绍，周程教授则对 Outreach 活动在日本的制度化进程进行了总结，任福君教授结合我国当前科学传播与基础研究相互作用现状及国外经验等提出了有益的政策建议，嵇晓华博士则从一个民间科普组织的层面谈到了一些有效尝试。刘立副教授以实证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当前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工作的状况及问题，并提出了相应

的对策建议；蒋建科先生以《人民日报》为例分析了媒体推进基础研究的实践案例，对如何借助媒体推动基础研究提出了若干建议等。

把脉科学基金中的科学传播问题

经过两天热烈的讨论，参加论坛研讨的专家、学者在科学基金工作中的科学传播问题上达成了几个主要共识。

第一，科学传播是科学家的基本责任。刘嘉麒院士指出，“科学传播是科学家的天职，科学普及有净化社会的功能……每一位有良知的科学家都应肩负起这份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在科学传播和科学普及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郑念研究员也指出，科普承担着广泛的社会责任，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应该具有一种评估思维，促进科普社会责任的实现，以构建和谐共荣的科学图景。

第二，多重动因促使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其中包括社会（及公众）的科学需求、科学家自身的需要、科学家的社会使命以及政策的引导机制作用等。郭传杰教授结合在国外的调研指出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基本动因，一是向公众及时地汇报传播基础研究成果是科学家回报纳税人的一种基本责任；二是社会（及公众）也需要了解科学家在干什么；三是科学家自身出于经费、后备人才储备等原因有科学传播的需求；还有科学家通过传播自己所做的工作来最大程度避免科学在传播过程中的失真。罗勇研究员则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谈到他热心气候变化领域科学传播的原因：首先是来自社会以及广大公众对于科学真相的强烈需求，其次来自于作为科研工作者对于科学传播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而同时，他所在的单位也给予了他从事科普的条件和制度安排。可见，社会、公众、科学家自身以及政府的政策等构成了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的多重动力。

第三，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工作面临多方面的瓶颈问题。例如对于科普工作重要性的价值判断不足、对科学传播工作认识的偏差、专

业科普人才的缺乏、政策保障机制方面的缺失(如缺少经费支持、没有评价激励制度)等等。

总之,与会专家学者共同为基础研究中的科学传播工作进行会诊把脉,梳理了一系列具体的共性问题:站在科学基金和基础研究视角的科学传播的概念界定问题;如何有效地促进科学家、科研管理部门等从事科学传播的问题;科学基金的科学传播体系中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的短板;向公众传播科学基金的项目成果、基础研究的过程以及科学家的方式方法问题。我们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做出有效的应对措施,以更好地促进基础研究与科学传播的有效结合,以更好地推动科学传播以及科技创新的共同发展。

让基础研究插上科学传播的翅膀

针对研讨中梳理总结出的一些主要问题,与会专家也给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和建议,来促进基础研究与科学传播的有效互动。促进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工作,需要多方配合,既要创造条件让科学家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科普工作,还应该在政策体制上有积极的引导,促进科学家从事科学传播工作。可采取的具体措施有:

在项目设置和经费分配中,应参考国际经验在我国的重大科研项目(如基金项目、973、863项目等)中明确科普经费的相应比例(程东红、任福君、郭传杰、何薇等);

在评价机制中将科普工作的评估纳入科研项目以及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例如,在科研项目的评审中加入科学传播的指标(刘立等),在重大科研项目及重点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提交中,除了科技创新成果之外,加入科学传播的成果,如果没有科学传播成果,将在以后的项目申请中加以限制(郭传杰、袁红莉等);设置科学传播奖项,引导科学家开展科学传播工作(蒋建科、穆荣平、王彦波等);在科研人员的年度考核中,加入对科学传播成果的绩效(Michel Claessens等)。

在人才培养机制中要建设专门的科普人

才培养体系。例如,加强对老科学家团队的制度引导,使之形成科学传播的主力团队,以机构(国家实验室)或者学科为要求建立专业的科学传播队伍;其次,运用制度建设吸引并建立年轻的科学传播队伍(汤书昆、穆荣平等);建立人才库,实现科学家与科学传播的有效对接(翟杰全、王彦波等);加强培训,设置科学传播能力培训的网络课程、进行科学传播的职业资格认定,发现和培养多层次的科普人才(穆荣平、高瑞平等)。

在科学传播模式上应积极采用丰富的科学传播形式、拓展科学传播的渠道和技术手段(如新媒体平台)、加强媒体的科学传播能力,搭建科学家与媒体、公众的交流平台(穆荣平、高瑞平、蒋建科等)等。

此外还有专家指出,科学传播需要科学文化的建设,需要政府部门推动科学文化的发展得到全社会的认同,进而推动科学传播的全面发展(张香平)。

会议研讨最后,与会代表针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科学传播工作现状,立足于提升其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工作水平提出了几点建议:基金委作为基础研究的重要资助机构,应该将每年的重要科技进展向全社会公开发布,并且有科学新闻发言人或建立一个常设展示机构面向公众展示最新科技进展(穆荣平、何薇等)、加强对基金委项目的社会效果评价(郑念);以基金委为主导,根据基金特点选择合适的科学传播策略,综合考虑国家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社会公众及科学家的诉求,结合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配合媒体,进行有针对性的科学传播(李浩鸣、王彦波等);进行基金项目科学传播的制度设计,如在基金项目评审中加入对科学传播要求,在基金项目结题中加入对科学传播的评估,在基金项目中配比一定的经费进行科学传播,加强科学传播研究的支撑等(李浩鸣、袁红莉等),针对这些制度设计可展开相应的调研,探索适合科学发展规律的科学传播体系(刘立、高瑞平等)。

(责任编辑 谢小军)